

Literature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 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变迁

胡希东 著

U
L
t
e
r
a
r
y
L
i
t
e
r
a
t
u
r
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 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变迁

胡希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变迁 / 胡希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448 - 6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821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李 斌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变迁研究”

（项目编号：11YJA751022）最终成果

序 论

一 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模式

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文学观念常常左右文学史叙述，而成为文学史叙述背后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是造成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地域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差异与变迁的潜在原因。朱栋霖先生在谈及文学史经典形成时指出，文学经典呈不断流动的状态，而文学观念的嬗变是推动文学经典流动的潜在原因，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经典的遴选标准也随之变化，不同的文学观念遴选出不同的文学经典。^①文学史叙述过程实际也是文学经典的辨别与遴选过程，以及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最终形成过程，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将带来文学经典的流变，最终带来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本论著在具体实施中主要以 20 世纪近百年为时间段，探讨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所带来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历史演绎与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任访秋把自己的新文学史著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这个时段的新文学史叙述都称为“新文学史”，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著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吴文祺有《新文学概要》，李一鸣有《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等；赵家璧则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来总结第一个十年文学发展的历史，周扬在延安也曾讲授《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这种“新文学史”的称谓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要》，以及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他们都把“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称为“新文学史”。与

^① 参见朱栋霖《经典的流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此不同的是丁易，他开始把自己书写的文学史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把“新文学史”改称为“现代文学史”，如50年代开始的学生文学史集体叙述，以及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这种名称的改变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应“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对应“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有重要关系。与此相对照的是台湾、香港地区及海外等的文学史叙述，他们则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称谓，如夏志清有《中国现代小说史》，李辉英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刘心皇有《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尹雪曼主编有《中华民国文艺史》，苏雪林有《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但周锦与司马长风还是把这段文学史称为“新文学史”，并各写有《中国新文学史》等。而到了80年代中期，钱理群等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指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文学的历史；紧随其后，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来整合“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此相应和的是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此不同的是朱栋霖先生，他还是把“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指称为“现代文学史”，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论著既是为论题命名的方便，更是为避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称谓差异在本论著中造成的混乱，无论其称谓“新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本论著均把20世纪初期自“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都特指称为“现代文学史”，并把这段时期的新文学史叙述都概称为“现代文学史叙述”。

本论著探讨的正是以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由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所带来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演绎变迁，在具体实施中主要选择以上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文本为对象，分析文学史叙述中各种影响因素，揭示文学史叙述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审美因素等错综复杂的关联，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形成与转型背后文学观念的潜在支配，以及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怎样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演绎变迁，这无疑有其独特价值与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就开始其历程，并逐渐活跃，一次又一次地将文学史叙述推向高潮，且这种浪潮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学观念的支配下还将持续下去。随着20世纪悄然逝去，对近百年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探讨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站在21世纪的高度，探讨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的

相互关系，探讨文学史叙述模式形成的潜在支配力量，探讨合理的、科学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并追问与反思现代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得失，这使该论题的实施尤显迫切，对今后文学史叙述无疑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本论题的实施有两个重要关键词：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模式。所谓文学观念，主要指人们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看法，包括对文学自身的内在“本体”特征，以及文学与外部关系的外在特征的认识与看法，等等。比如，对文学的内涵、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价值、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的社会作用等的认识与看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与看法各不相同。比如，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偏向于文学自身的内在“本体”特征，另一个历史时期则倾向于文学与外部关系的外在特征，等等，这些使文学观念具有历史流动变化的特征。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观念属于历史的范畴，它是流动着的、变化着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观念是永恒不变的。”^①而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则是推动文学观念变化的根本原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②即时代社会的风尚影响文学的变化发展，也影响文学观念的演绎变迁。因此，童庆炳先生也指出：“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化发展，是文学观念更替的根本原因。”^③文学观念影响文学史叙述，不同的文学观念影响文学史叙述者对文学史事件，以及作家、作品的偏向、选择、吸收、评价，等等，并进而影响著者的文学史观念，而文学史观念则直接支配文学史叙述的看法与主张等，并最终制约着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形成。

文学史叙述模式是文学史具体组织结构的呈现，它是文学史叙述者在建构文学史过程中，对文学史事件、作家、作品的选择取舍，以及对文学史具体叙述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原则，而这些方法、原则支配组织着文学史的内在结构。本论题中文学史叙述模式中的“模式”（Paradigm）启示于托马斯·库恩有关“范式”的论述与进一步引申。托马斯·库恩曾述及“范式”的内涵：“‘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

① 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学观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1页。

③ 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学观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称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① 在这里，库恩称谓的“特定共同体”主要指一个学科专业的学者或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即库恩所指的“科学共同体”，对此他有如下论述：“一个科学共同体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② 而库恩指称的“范式”就是指这个“科学共同体”进行科学探究所运用与遵循的“模型和范例”。因此，有学者把“范式”理解为科学发展的结构、模式，并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为“范式”。范式常通过具体的科学理论成为范例，它是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③ 由以上叙述可看出，“范式”作为库恩叙述科学历史发展的重要关键词，可以看作科学发展的结构、模式，主要指“科学共同体”（即我们称之为从事共同学科、专业的学术团队等）在特定历史阶段从事某一学科活动共同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和范例”，它包括从事该学科共有的理论、方法、原则等。在当下，有关“范式”的理论早已超出了库恩所赋予“范式”的具体内涵，它被描述为一种学科模式、结构、思维方式、理论模型、价值标准等，并广泛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可以说，“范式”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叙述科学历史发展最频繁使用的词汇。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实际就是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而其重要表现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④

本论著中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即是对库恩“范式”理论的借用。文学史叙述者在文学史叙述过程中，对文学史事件、作家、作品的选择取

①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② 同上书，第159页。

③ 参见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④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舍，以及在文学史具体叙述过程中采取一定的方法、原则，而这些方法、原则支配组织着文学史内在结构的形成，即形成文学史叙述模式。而文学观念是支配文学史叙述的潜在力量，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将推动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化。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在一定历史时期、共同政治地域以及相同的社会语境下，其文学史叙述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类同性；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地域、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学史叙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其潜在原因主要是文学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史观念的差异。比如，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观念的变化、差异，必定带来文学史观念的变化，也必定带来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改变，而由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所带来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更替就是其明显表现。

二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律动

20 世纪是中国文学发展最特殊、最关键的历史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传统中国文学开始向现代文学的真正转化，它还是现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新文学的诞生、发展、成长，它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叙述历程！而在 20 世纪发展历程中，人们怎样认识这段文学发展的历史？人们对这段文学史有怎样的接受过程？为何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地域下对该时段文学史叙述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文学史叙述常呈不稳定状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不同文学理论框架中，不同著者对同一时段的文学史、同一文学史现象、同一文学史事件的文学史叙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些都是文学观念的潜在支配与推动导致的，由于急剧而频繁的社会变迁，这一现象在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尤显突出！

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学史叙述的出现，是文学史叙述模式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更替是文学观念变化的潜在推动。传统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有学者曾将传统文学史叙述体例概括如下：（1）题辞体，如《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其特点是以作品为评价对象，通过对其评价、考订，以揭示一代或几代作品的大旨和源流关系；（2）传记体，如《唐才子传》《文苑传》等，它们主要以作家为中心，有重点地评价作家的文学活动与创作；（3）时序体，如《文心雕龙·时序》《诗源辩体》《诗薮》等，它主要以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以及每一时代的

文学风貌给予叙述评析；(4) 品评体，如钟嵘《诗品》，它主要将作家分成上、中、下三品给予评析；(5) 派别体，如《中晚唐诗人主客图》《江西诗人宗派图录》等，其特点是以流派论文，重在表述派系承传关系；(6) 选录体，如《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其特点是虽然也以人物为中心，但辑录了有关本事或略加品评，其特点是每人都辑录了一些代表作品。^①

事实上，以上六种体例只是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雏形，真正具现代品质的文学史叙述却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之后。鸦片战争后，传统国门打开，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方文学观念冲击着传统中国文学，使传统文学观念开始转变并发生现代转型。这表现在人们对文学本体的认识，以及文体结构、语言媒介等逐渐改变上。如对文学的理解由原来的杂文学观念开始向纯文学观念转变；文体结构上，传统文学多以散文、诗歌为正宗，而小说、戏剧被排斥的局面得到改变，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成为文学的四大文体；在语言上，以白话代替文言。传统文学观念的改变与现代转型对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有明显重要的影响。刚开始的文学史叙述，由于著者文学观念的驳杂，写出的文学史多是文化史、学术史。如形成于20世纪初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就是受日本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刺激与推动，著者明确说该文学史是模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史讲义而采用纪事本末体编撰而成。^② 由于支配著者的主要是传统文学观念，该文学史主要叙述的是文字、音韵、训诂、骈文等的演绎与变迁，而戏曲、小说被视为“淫辞邪说”，因此，“林著名为《中国文学史》，实则是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③ 而与此同时，由黄人编写《中国文学史》开始，以及其后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这些文学史叙述的虽是传统文学，但却有文学现代观念的烛照；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更是以文学的现代观念来叙述传统文学，其文学史开宗明义即是他们文学观念的表达，如对“文学”的界定，他们常将

① 参见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54—755页。

② 参见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印行发行宣统二年六月朔校正再版，第24页。

③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84页。

当时中、西有关“文学”的界定结合起来观照文学，而文学的“进化”观念则是他们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理论基础，谭正璧更把他的文学史直接命名为《中国文学进化史》。正是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带来了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改变，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叙述的繁荣与热潮。

新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它是在对传统文学的否定与叛离中不断发展，并逐渐走向兴盛与壮大的。相对于传统文学而言，新文学的历史发展较为短暂，最初新文学历史叙述其表现之一即是对传统文学史的依附，其重要表现就是文学史家在描绘传统文学史的同时，都在其后以一定章节描绘新文学短暂的历史。比如，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写有“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章，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写有“新时代的文学”一章，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写有“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一节，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写有“当代文学：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文坛”一节，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写有“民国以来的国语文学”和“最近革命文学之趋势”两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写有“文学与革命”一节，等等。随着新文学历史的发展，新文学观念逐渐明确，各种文学史事件渐趋清晰明了，新文学史的独立叙述渐渐起步，特别是在一些大学里，新文学历史被搬进课堂，开始设置新文学史课程，这使新文学史作为独立叙述形态逐渐形成。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学思潮》、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等。著者开始以独著的形式叙写新文学发生及发展的历史，虽然其历史短暂，只有短短的十年或二十年，但新文学史叙述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总观此时期的新文学史叙述，著者对文学的认识，特别是对新文学的具体认识，以及文学的“进化”观念作为新文学合法性、独立性的潜在根据，这些成为新文学史叙述的支配力量，“社会型”“文体型”文学史叙述模式雏形成为此时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重要表现。

1950—1980年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的国家制度带来社会的巨大转型，这也使文学观念发生巨大改变。其中，文学服务于新的国家制度，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服务于新的国家体制是其重要表现。而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潜在基础。最为明显的表

现是新中国教育体制的参与。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将新文学史作为课程设置，并请王瑶、蔡仪、李何林、老舍编制《〈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主要意图是要编制符合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以及体现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叙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整整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叙述的主流模式，即文学服务于新的国家体制，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现代文学史叙述绝对的支配力量。此时，最早出现的新文学史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著者在“绪论”部分尽力彰显毛泽东文艺思想，但却与文学史叙述的主体部分所表现的文学审美意识，以及文学史叙述的“文体型”文学史叙述模式发生了张力。紧接其后的是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他们的文学史叙述能较好地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现实政治融合于文学史叙述中，新中国文坛为配合新的政治任务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丁易、刘绶松的文学史叙述则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模式，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文学史叙述却难以适应急速变化的现实政治，于是新文学史“个人叙述”被“集体叙述”所取代。最具代表性的是成书最为长久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文学史“集体叙述”的代表，现实政治照样反射于文学史叙述中，如文学的阶级分析、“以论带史”等存在其文学史叙述中，并形成了“作家型”文学史叙述模式。

与此同时，不同于内地的政治空间，港台地区、海外一些学者也撰写了新文学的历史，最具代表性的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等。不同的政治地域、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是该时期文学史叙述的外在条件。而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文学史观是他们文学史叙述模式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周锦的文学史叙述是典型的文学史政治文本，它体现了台湾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苏雪林的文学史叙述表现出浓厚的“纯文学”观念，但其文学史叙述照样是著者政治意识形态的明显折射，无论是周锦还是苏雪林，其文学史叙述都采用了“文体型”文学史叙述模式。事实上，港台地区、海外众多文学史叙述中，夏志清与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具典型，成就最高；夏志清先生文学史叙述依托于西方政治语境与文化背景，其文学史叙述具有浓厚的“西方”想象与现代性追求；不同于夏志清的文学史叙述，身处香港殖民化语境，“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的归属之感，对政治异化的排斥，这使司马长风的文学

史叙述更具“民族”想象与纯文学追求。夏志清与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各代表两种不同于内地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正是因为这样，1950—1980年这段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下，在民族、国家支配下，该时段内地、港台地区以及海外的文学史叙述呈不同的地理特征。^①该时期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文学史观，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它们相互钳制、相互制约、相互刺激，这对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内地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转型有重要影响与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内地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观念、文学观念冲击当时的中国文坛，这些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巨大改变。此时期的文学史叙述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重写文学史”的牵引推动下展开的，对政治的疏离，向文学审美本体的回归，以及文学史叙述的“现代性”追求等成为一段时期文学史叙述的主导模式，这从根本上挑战了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主宰与规范。与之同时，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使文学史叙述趋于多元形态。该时段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是钱理群先生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孔范今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等。他们的文学史叙述成为此时期文学史叙述新的重要模式。在此时的文学史叙述中，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带来的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新与旧”“雅与俗”，以及“人的文学”观念，等等，支配着此时期的文学史叙述。

以上是20世纪以来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所带来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变迁的大致情形。文学史首先是“文学”的历史，由于特定历史、特定地域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文学的看法表现出独特的历史差异与地域差异等，这势必反映在文学史叙述模式上，因此，就文学观念的演绎与转型来探讨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是本论著实施的主要着眼点。王瑶先生曾说：“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它要求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历史联系。确认文学史具有‘文艺学’的性质，首先是对长期存在的

^① 参见胡希东《民族·国家与文学史地理——1950—1980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形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以政治鉴定代替文学评价’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一个否定；并由此明确了文学史应该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衡量一个作家对文学史的贡献，确定其历史地位，主要看他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面对作品质量的评价则应该坚持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注意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特点。”^①从王瑶先生的论述可看出，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是著者进行文学史叙述的根本，而著者的文学观念在文学史叙述中起重要的支配作用。文学观念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学史叙述的潜在基础。由于影响文学史叙述外在因素的多样性，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这势必渗透于著者的文学观念中，并最终在文学史叙述模式上表现出来，这也使文学史叙述表现出迁延性特征，即同一段新文学的历史，在不同的地域中，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而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因此，文学史叙述研究必须回到文学观念，尤其是应回到对“文学本体”的认识上。

本论著在具体的操作中，主要对 20 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进行实证考察，这不乏对文学史文本、文学史事件等的细腻解读，探寻支撑文学史叙述背后的运作的原始动力——文学观念；同时，也不乏文学史叙述的外在因素：体制权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所体现的权力对文学史书写的规范、干预的考察与探讨，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这是支配文学史叙述的原动力或根本。由于本论著涉及的时间与地域，以及文学史文本较为宽泛，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尽量突破大量文学史文本、具体的文学史文本、具体的文学史事件等繁杂因素的束缚，尽量回避蜻蜓点水般的泛泛而谈，努力做到研究视野的张弛有致，在研究视域上努力做到能大能小。小，只是一文学史文本、一文学流派、一作家、一诗人、一作品；大，从纵向看，是 20 世纪初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学史文本，前后百年的文学史叙述历史，从横向看，涉及内地、台港，甚至“海外”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大处能做到视野开阔，小处也能做到文本的细腻解读，并将之完美融合而落实到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在方法上，尽量回避过去文学史研究中有史无论，或有论无史，而是做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史的方面，运用考证与文学史文本的细腻解读，让具体问题落在实处；在论的方面，涉及具体的文学理论（包括特定时期的文学观

① 《王瑶全集》第 5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4 页。

念)、美学观念、文学史观的运用,以及当今的前沿理论,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叙事学、阐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运用,这也是本论著具体实施的解剖刀,只有将这些完美融合才能做到史论结合。在研究对象与视角上,主要是对20世纪初以来已经存在的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进行考察研究,文学史著述繁多,涉及的范围较广,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只选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文本,并将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作为研究的视角与窗口,做到“以一斑而窥全豹”,尽量向纵深处开拓。

目 录

序论	(1)
一 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模式	(1)
二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律动	(5)
第一章 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初期新文学史叙述	(1)
第一节 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新文学史叙述	(1)
一 “进化论”与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1)
二 “进化论”与新文学史叙述	(5)
第二节 新文学观念与新文学史叙述	(10)
一 新文学观念与新文学史叙述	(10)
二 文学“写实”观念与新文学史叙述	(16)
第三节 初期新文学史叙述模式的雏形	(28)
一 “社会型”文学史叙述	(29)
二 “文体型”文学史叙述	(36)
第二章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文学史叙述	(49)
第一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文学史叙述新模式的开启	(49)
一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文学史观	(50)
二 新文学史叙述新型模式的开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54)
第二节 文学审美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张力	
——王瑶的新文学史叙述	(56)
一 “绪论”的设置与主流意识形态	(57)
二 “文体型”文学史叙述模式	(64)

第三章 主流意识形态与新文学史叙述的“现代”转型	(73)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代”内涵	(73)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83)
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的形成	(83)
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史建构	(87)
第三节 “集体”对“个人”的疏离	(92)
一 “个人”走向“集体”的历史必然	(92)
二 “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与现代文学史叙述	(97)
三 “阶级分析”与“作家型”文学史叙述模式	(110)
第四章 现代文学史叙述的“西方”想象与“民族”追求	(119)
第一节 现代文学史叙述的“西方”想象	
——夏志清的文学史叙述	(119)
一 “道德意味”“宗教意识”与文学史建构	(121)
二 文学史叙述的现代性悖论	(131)
第二节 民族文化认同与新文学史叙述	
——司马长风新文学史叙述的民族追求	(146)
第五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学史叙述	(157)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	(157)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	
文学史叙述	(159)
一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	(159)
二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意识形态	(162)
第三节 民族、国家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版图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维度与	
文学史叙述	(164)
一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维度	(165)
二 民族、国家与“20 世纪中国文学”	(169)
三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	(172)